

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探

仁钦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1955—1981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下放到农村牧区的知识青年达到 2000 万人。本文主要利用相关档案史料来探讨、解明以下几个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至 1966 年)转变及其原因?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返城”“再教育”与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有何关联?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特征及其特殊背景?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自足问题实际状况如何?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运动的思想认识又是怎样? 以期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关键词: 内蒙古;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1955—1981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下放到农村牧区的知识青年达到 2000 万人。^[1]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并列进行,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以“再教育”的形式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有 1400 万人。^[2]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 最早在上世纪 70 年始于欧美。例如, Thomas P. Bernstein 利用官方报道,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源、目的、政策、过程及其政治与社会作用进行较详细、全面的考察。^[3]Stanley Rosen 利用报纸和当时在广州出版发行的《支农红旗》《红旗贫下中农》等书刊以及人物采访记录, 对广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特征、参加政治斗争以及 1978 年以后的“返城”状况等进行了分析。

在国内, 有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中期之后较为活跃, 已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 定宜庄和刘小萌分别对 1953—1968 年和 1966—1980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论述, 从而被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集大成”。^[4]顾洪章立于政治、经济、历史的视角,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考察, 具有代表官方见解的性质。^[5]此外, 还有金大陆、金光耀编的论文集等。^[6]另外, 在日本, 有渡边一卫、川副延生、崔勇等的研究。^[7]其中, 考察了湖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述研究成果包容了很多的有益相关信息, 是本文的基础。但是, 这些研究几乎没有能够言及到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关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只有邢野的具有地方志性质的通史,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资料集, 史镜、李明启等的调查报告以及刘凤琴的概述等。^[8]

因此, 迄今为止, 关于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系统的、详细的研究论著还没有出现,

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明。诸如：(1)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至 1966 年）转变及其原因？(2)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返城”“再教育”与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有何关联？(3)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特征及其特殊背景？(4)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自足问题实际状况如何？(5)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运动的思想认识又是怎样？所有这些问题，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都找不到答案。本文主要利用相关档案史料以及回忆录与采访记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①1955 年 9 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9]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的指示成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指导思想的口号。这一指示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判断与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1960 年 4 月 10 日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号召“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以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其理由是“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10]

同年 7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安置小组组长会议的报告中，强调了城市学生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并指出了之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建立新的国营农、牧、林、渔场；并且要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统管起来。^[11]

1964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动员、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样，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决定的指引下，展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各级专门机构也相继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初的目的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和改善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的。其主要动员对象是农村牧区的中小學生，是在地方政府机关自行组织和知识青年自愿的形式下进行，所以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了解决“三面红旗”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困难的一种手段，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各级专门机构也相继建立。

1962 年末，中央设立了由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组成的知识青年专门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设立了领导小组。1963 年，中央设立了以谭震林为组长城市知识青年安置领导小组。在此，简单说明知识青年管理组织机构的变迁。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谭震林被打倒之后，这些机构被撤销。1968 年以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央是在军事代表管理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在各省、市、自治区是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1973 年 6 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在全国人民公社级以上的机关设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这样，1962 年在中央、各省、市、自治区设立专门机构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地方政府机关自行组织和知识青年自愿的形式转变为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的形式。1962 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爆发期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达 129 万 2800 人。其中，安置到人民公社的有 87 万 600 人，占总人数的 63.7%，安置到农场 42 万 2200 人，占总人数的 32.7%。^[12]在此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改善农村落后状况、开发边境地区结合到了一起，有其社会经济要因。^[6]

（二）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

在此，试考察党政机关指导下的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的 1964 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 1966 年期间的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进展。

1956 年 1 月 11 日，前往乌兰察布盟农村的呼和浩特市知识青年 157 组成的“青年建设新农村志愿队”和包头市 230 名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农业合作社。1957 年 8 月，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的 60 名知识青年下乡到陈巴尔虎旗。这些是在地方政府机关自行组织和知识青年自愿的形式下进行的。由党政机关主导下的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 1964 年开始的。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动员、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 年 5 月 23—31 日间，在内蒙古党委书记王再天的主持下，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城市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

会议，首先，强调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牧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组织他们集体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是建设新农村、新牧区的一项重大措施。并具体指出：“我区农村不少地方一个劳动力要耕种三、四十亩地，甚至五、六十亩地，耕作粗放，单产很低；牧区不少地方一个劳动力要放好几百头牲畜，都是十分缺乏劳动力，特别是有文化的劳动力。一批一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牧业第一线去，既有利于稳定农村牧区青年从事农牧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牧民队伍。同时，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农牧业生产，也为城市知识青年开辟了广阔的革命道路，他们与农牧民结合，在农村、牧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将锻炼成长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3]

其次，提出了如下的知识青年安置具体计划：（1）1964 年我区的安置重点地区是巴盟的五原县、临河县、乌拉特前旗、杭锦后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等五个旗县。（2）其他各盟也要选择重点旗、县，旗、县选重点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选重点大队和生产队。（3）牧区，只在巴盟乌拉特中后期和锡林郭勒盟进行试点安置。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安置少数民族青年为原则。（4）安置地点一般应以就地安置为原则，一般不跨盟、不跨旗、不跨县安置。^[13]

最后，会议指出，在安置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四个为主”的方针。即以插队为主，插场为辅；以适当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以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为主，兼顾城市闲散劳动力；以思想工作为主，必要的物资保证为辅。^[13]

1964 年 6 月，以王再天为组长的内蒙古自治区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立，并设立了办公室。各盟、市和有安置义务的旗、县设立了党政机关领导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基层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也分别设置了以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政治队长为领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分配小组。在此基础上，1964 年 9 月，181 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专任干部被分配到基层单位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14]党政机关主导的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这些组织和干部的领导下展开的。

党政机关主导的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按着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内蒙古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安置计划推行的。其安置计划中，1964 年、1965 年分

别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 万 2000 人、6090 人。[15]但是，计划没有能够达到计划的目标。例如，到 1964 年 9 月，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724 人，只达到当年计划安置总人数 1 万 2000 人 14.36%（详见表 1）。同样，到 1965 年 6 月，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342 人，只达到当年计划安置总人数 6090 人 22.00%（详见表 2）。还有，有安置义务的 4 个是和 55 个旗、县中，只有 2 个市和 25 个旗、县展开了安置工作。[14]

表 1 1964 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进展情况

地 区	计划安置人数	实际安置人数	百分比
全自治区	12,000	1,724	14.36%
呼伦贝尔盟	1,000	359	35.90%
哲里木盟	600	129	21.50%
昭乌达盟	900	82	9.10%
锡林郭勒盟	1,500	177	11.80%
乌兰察布盟	1,500	106	5.90%
巴彦淖尔盟	5,250	846	18.10%
呼和浩特市	200	5	0.50%
包头市	500	24	4.80%

（出所） “当前全区一九六四年安置进展情况”（1964 年 9 月 7 日）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工作汇报》1964 年第 11 期，内蒙古档案馆 324-2-2。

表 2 1965 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进展情况

地 区	计划安置人数	实际安置人数	百分比
全自治区	6090	1342	22.00%
呼伦贝尔盟	1140	174	15.30%
哲里木盟	500	82	16.40%
昭乌达盟	750	103	13.70%
锡林郭勒盟	800	195	24.40%
乌兰察布盟	800	114	14.30%
巴彦淖尔盟	700	351	50.10%

伊克昭盟	400	150	37.50%
呼和浩特市	500	92	18.40%
包头市	500	81	16.20%

（出所）“当前各地安置工作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工作汇报》1965年第8期，内蒙古档案馆 324-2-4。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报告中，对于没有能够实现预期安置计划的要因列举如下：（1）有些干部，甚至领导同志对安置工作的革命意义认识不足。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实际。（2）也有些资本主义思想。城市有的同志担心男的下去多了工厂招不到工人，女的下去多了男职工找不到对象。农村干部接人选人条件过严，不愿接受闲散劳动力和随行家属。（3）有些职工、干部家长漠视甚至公开反对和蔑视、攻击党的政策和革命方针，不折手段地阻挠子女下乡，甚至违法乱纪，成为青年、子女响应党的号召，奔向革命道路——下乡参加建设的严重阻力。（4）城乡间、各部门间挂钩、密切配合抓得不好。^[14]

上述几点，都被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障碍物、政治问题，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官僚主义思想，加以批判。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1964年9月的报告中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地认识安置城市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参加农牧业生产劳动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是减轻城市负担，同时也是支援农村、牧区建设，更重要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者，使他们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这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社会主义的城市不能有闲散无业的人寄生和滋生是非，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14]

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视为当时政治运动——“四清”“五反”运动的内容之一。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64年9月的报告中强调：“要把安置工作和以‘四清’‘五反’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大反资产阶级思想，大反修正主义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14]

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人数有了快速增长。以1964年为例，至10月份，安置人数已达9838人。^[16]已经超额完成了安置6090人的年度计划。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方针的转变。1964年6月召开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较为慎重的安置方针：“牧区插队，今年仅在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中后旗和锡林郭勒盟选点试行。其他地方暂不进行。对少数民族聚居的队，一般只宜安置本民族的青年”。^[13]但是，中共华北局安置工作会议（1964年9月2日—6日）上，华北局和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指示：“内蒙明年（1965年）去人要考虑牧区多去些，山区、牧区这些文化较落后地方越欢迎有文化青年”。^[17]由此，改变了此前的内蒙古蒙古族聚居牧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慎重方针，1965年开始内蒙古蒙古族聚居的牧区也开始安置了非本民族的青年。例如，1965年7月30日—8月18日间，在巴彦淖尔盟杭锦旗等地199个生产队里集体安置了来自北京、天津的2320人。^[18]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1965年巴彦淖尔盟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700人的计划。为什么会有这样转变呢？有其如下的独特的国际背景与国内形势。

第一，从国际环境变化来讲，中苏关系的内蒙古地区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外交方针是“向苏一边倒”，并且迎来了“中苏蜜月”^③期。但是，“中苏蜜月”未能维持长久，从1958年开始中苏间关于社会主义战略问题就产生了分歧；1959年6月苏方废弃了1957年制定

的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决定”；到了1960年7月，苏联撤回了援助中国的专家并且停止了援助建设中的项目；从1963年开始中苏意识形态领域激发争论，中国把苏联和蒙古国视为苏蒙“修正主义”；甚至于1969年发生了中苏军事冲突。

在中苏对立的时代，地处边境的内蒙古在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防御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首先，内蒙古地处中国北疆，面积为1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2.3%），并拥有4221公里的中苏、中蒙边境线；其次，蒙古民族居住于我国北部边境地区，还有众多同胞又居住在苏联、蒙古国境内；再次，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几次发动蒙古民族统一或独立自主运动。

第二，从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来看，众所周知“向共产主义过度的整个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继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当时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四清”运动是在“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理论下进行的。^[19]在内蒙古的“四清运动”中，民族问题成为了焦点，民族特征被当成为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对象。^[20]

上述背景，对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特别是对牧区安置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是蒙古族聚居的内蒙古牧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方针发生了转变，而且党员、团员占上山下乡中青年中的比例也高于汉族聚居的地区与内蒙古整体地区。例如，安置到巴彦淖尔盟杭锦旗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320人中，党员和团员有906人，占总数的39%。^[21]同样，安置到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来自北京、天津的知识青年2000人中，有党员、团员582人，占总数的29%。^[22]

另一方面，至1971年安置到汉族聚居的乌兰察布盟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万3508人中，党员和团员787人，只占总数的2%。^[16]从内蒙古整体来看，安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党员和团员也占总数的5%。^[23]

还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多数的党员、团员担任“四清工作队”干部或是其成员，担任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员。^[24]内蒙古牧区“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是在与苏联和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由此布置和实施的基本方法是采取“先边境，后内地”的方针。^[25]显然，牧区“四清运动”是具有先从边疆地区开始的特征。^[20]

综上所述，中苏关系恶化中，位于北部边境并与苏联、蒙古国接壤的内蒙古牧区，对于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全占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不能否认内蒙古有关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中，中央、内蒙古的领导者对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怀有的悬念。

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

1966年后半年以后，出现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不仅是城市知识青年在“回城闹革命”的口号下返回城市，而且，农村知识青年提出“立即取消城乡差别”的要求，大批涌入城市。据统计，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几个月中，全国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120万人。^[26]据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报告，1967年出现了大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例如，乌兰察布盟和巴彦淖尔盟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分别占总数的70%和49%。^[27]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的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1966年8—11月，因串连毛泽东接见了由全国各地来至北京的1100万红卫兵，由此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红卫兵迅速进入社会造反，成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急先锋，用打、烧、搜、抢等各种暴力手段进行了破坏活动。1966年8—9月间，北京4100所文化遗产和古迹被破坏；上海8万4000户被搜家，贵重财产被抢走。众多的民主人士、宗教人士、文化人士受到殴打与侮辱，甚至发生了打死人的事件。^[28]在这样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为红卫兵返回到

城市。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的原因之二,是在农村与农场常有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受害事情。^[29]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更为显著,在内蒙古有如下的事例。(1)在政治上遭受严重迫害。比较普遍的是借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身不好”或“成分不好”,解除他们担任的行政职务或社会工作,不让他们参加会议,不准他们参加民兵、红卫兵以及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方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成“黑帮”,或称为“小牛鬼蛇神”,按四类分子对待。对他们“训话”限制他们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劳动权利。特别是“二月黑风”中,利用专政工具或者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敢于造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了镇压。例如,巴彦淖尔盟中后旗共有420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受围攻、被斗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就有近100人。(2)生活不能自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欠债的增多,患病的增多。例如,巴彦淖尔盟五原县2300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欠款9万多元。突泉县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80%的人有病。有些旗县多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没有或很少参加劳动,生产队不予分配口粮。(3)安置工作机构瘫痪。原设的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均已瘫痪。许多地方的安置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27]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有病人数多之事。女知识青年必须与男知识青年、男农民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同工不同酬。再加上上山下乡生活卫生、医疗条件过差,女知识青年中有病者的比例非常高,最普遍的是妇科疾病。^[30]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受性侵害案件多发之事。此类案件发生最多的是乌兰察布盟,据档案资料统计,225件知识青年被害案件中,112件是女知识青年受性侵害案件。^[31]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的结果,给社会带来了混乱。首先,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国营农场因知青的离去而使生产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其次,涌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四处建立群众组织和联络站的活动,组织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组织——“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进入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武斗”,甚至发生了死人事件。^[32]

接着,考察中央和内蒙古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的态度。首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67年2月17日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该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同月27日又发出《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凡在外地进行串联、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33]另一方面,在北京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真理革命防卫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组织被取缔。

其次,在内蒙古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1967年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落户的暂行办法(草案)”规定:凡因病、伤残等原因,经旗县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已不适合参加农牧业生产劳动,在短期内又不能回复健康者;因年小体弱多病(16周岁以下,患慢性病短期难愈),一、二年内生活不能自给者;因家长患病、伤残,家庭生活极端困难,非本人返城照顾不可者,要求返城落户,由本人申请,经下乡知识青年民主评议,贫下中农同意,社队签注具体意见,由旗县安置办公室批准,办理迁户手续。^[34]

1967年9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停止执行上述“暂行办法”。^[34]这意味着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无条件返回下乡地区。

第二，关于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发生问题的所持态度与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被视为“由于以乌兰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为大目标，竭力抵制和破坏这项工作，致使过去的安置工作问题成堆，至今尚未很好解决”。^[35]（2）1968年4月1日，内蒙革委会常委雷代夫在全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在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成就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就问题出现的原因批判到：“有些地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突出政治很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经济主义”。^[36]即把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当成了乌兰夫的“罪行”。（3）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落户，被认为“大多数人属于思想问题”。为此，号召“各级安置部门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积极参加农村牧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粉碎内蒙地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和阶级敌人的任何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4]

第三，1967年10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7年4月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中最早成立）发出一下通知，要求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1）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应自觉地迅速地返回农村。（2）共青团、公安、民政、文教、劳动等有关部门，有关革命群众组织，都应积极做好动员工作。对私自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各单位都不得安排工作，不得落户。（3）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中，凡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无正当理由撤职的，应回复其工作。（4）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劳动生产的权利。^[34]

第四，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建设内蒙古农村、牧区的重要性，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边疆和反修前哨，又是民族地区，更需要有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牧区参加革命和建设”。并进一步强调：“重不重视这样工作，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问题”。^[34]

与此同时，内蒙古安置班红色革命造反战斗队全体革命群众，为了加强安置工作领导特向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提出以下几点：（1）由吴涛同志和高锦明或自治区其他主要革命领导干部亲自负责这项工作。（2）在即将成立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或政工委员会下设安置组，具体领导全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3）安置组由20人组成。抽调革命领导干部2名以及解放军、团委、教育厅、劳动局、安置办的部分革命造反派干部参加工作。^[34]

之后，于1968年6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正式改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委员会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这表明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相关联，使其更加政治运动化了。

四、“再教育”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再教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红旗》1968年第3期刊载了毛泽东的“对教育工作者进行再教育，使其与工农相结合”，“旧学校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能够与工农相结合。……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让他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的指示。这就是正式提出来的“再教育”理论。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关于“再教育”提出：“解放前毕业的知识分子受的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解放后毕业的知识分子受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无论哪个都必须接受改正资产阶级的教育”。同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中，首次提出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的是贫下中农。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是有必要的”的指示。从此，掀起了全国性的、以政治运动为形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在1968—1978

年的 10 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已达 1623 万人。[37]

在内蒙古，1968 年 3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关于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报告”中，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性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我们怀着对毛主席崇高信仰，无限忠诚，满怀热情地、积极负责地做好这项工作，否则，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犯罪”。[38]

其后，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发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性质的指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提示》中指出：“愿不愿意、实行不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检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分界线，唯一标准”。[38]再如，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刘文研在全区中学毕业生分配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会议上讲到：“毕业生分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本身就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广大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青年真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条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读书当官论’，把青年引向脱离工农的修正主义道路，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39]

刘文研又谈到了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挖肃运动”的关系问题。其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1）毕业生分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挖肃运动”，方向和内容上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彻底打到，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在教育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流毒肃清，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保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2）学校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都在上山下乡方面有破坏活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也都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无事生非，造谣惑众。把他们揪出来，就是“挖”，把他们斗倒批臭，就是“肃”。如果不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批臭，不把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深批透，毕业生分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就搞不好，也谈不到“挖肃”斗争的决战决胜。（3）毕业生分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面的“挖”和“肃”是内蒙古“挖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侧面。[39]

另一方面，1968 年 3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发出了“重要通知”。首先，在肯定走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三大革命中的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指出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是因受了一小撮走资派的煽动和中国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等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流毒影响。其次，批判放弃“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长期逗留城镇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和中央指示精神。最后，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特通告如下：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必须坚持到底，坚决捍卫。任何歪曲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和动摇这一革命方向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抵制。

（2）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倒流城镇的知识青年，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发出的“就地闹革命”的战斗号令，立即动身返回生产岗位，坚决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3）公安部门应会同上山下乡工作部门，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返回城镇的下乡青年户口做一次重新审查，凡不符合规定或以不正当手段在城镇落户的，一律无效。凡是违反中央规定擅自为倒流城镇的下乡知识青年落户以及安排工作的部门和单位，必须立即纠正，并负责动员他们社队。

(4)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的亲属，要遵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积极动员和支持自己的子女愉快地返回社队，教育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坚守岗位，积极工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5)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社队“抓革命，促生产”，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我的号召的革命行动。农村、牧区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要积极支持这一革命行动，热情欢迎他们返回社队。城镇各部门、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深入、广泛地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政治意义，积极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和本通知的各项规定。[38]

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接见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代表时，鼓励在少数民族地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讲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内蒙古每年平均进来 15 万人，多数是盲目流入的；现在进来的是有文化的人，人的质量不同了”。并称赞上海知识青年占多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现在实际上是‘上海的新疆’，上海去的男女青年很多，搞得很好”。另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判：“内蒙过去乌兰夫搞反汉排外，不搞这些，呼伦贝尔盟岭北过去搞了一点，被乌兰夫排外给赶出来了，是我们在哪里没有基础”。[40]其目的是，在民族地区的内蒙古安置更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草案）》，1968 年内蒙古自治区共接收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8.4 万人，其中接受安置“支援内蒙古建设”北京、天津、南京等地 4.4 万人，区内安置动员 4.0 万人，为 1962 年以来历年安置总数 3.2 万人的 2.6 倍。又因“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边境，反修前哨，地广人稀，边境线长，迫切需要大批新生力量充实和加强我们的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决定 1969 年将从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接收安置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 29 万人。再加上自治区内各盟、市、旗县自己对于安置 10.6 万人，共计 39.6 万人。[41]

1973 年内蒙古自治区规定：“城镇中学毕业生除直接升学和不动员下乡的几种人之外，其余都得动员下乡”。之后的几年城镇毕业生的分配基本按此规定进行的。

在此之前，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也缺乏具体计划，各个城镇、各个年度做法都不一致，有时中学毕业生一律下乡，有时又不做动员，全部留城。所以，1972 年和 1973 年下乡仅有 5000 至 6000 人左右。1973 年有了统一规定，1974 年和 1975 年全区下乡人数分别上升到 1 万 8000 多人和 3 万 2000 多人。1975 年至 1977 年的 3 年间，共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 7 万 4376 人，相当于前 10 年下乡人数的总和。[42]这样，1979 年末为止，内蒙古自治区共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51 万 7634 人。[43]

五、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建设有了大大的推广，建立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州、兰州、安徽、江苏、福建、浙江、山东、湖北 11 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江西、广西 3 个农业建设团。其背景简单概括有三点：（1）在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混乱中，农垦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垦机构被撤销，从而正常的生产秩序无法维持。（2）“三支两军”政策的实施。④（3）“准军事力量”的强化。⑤

在内蒙古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了上述背景之外，还有如下特殊背景：反修正主义前哨；蒙古民族居住于我国北部边境地区，还有众多同胞又居住在苏联、蒙古国境内，并且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几次发动蒙古民族统一或独立自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内蒙古进行了全面的军事管制；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降为小军区，并置于北京军区管辖之下；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分之二的领域被分割、合并到了邻近的省、自治区。

1966年5月建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7月被改编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由国营农牧场、劳改农场以及人民公社改编而成的,其采用的是师—团—连的编制,由6个师、40个团组成。人员构成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地方干部、原农牧场职工、知识青年。其中现役军人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

据统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中,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省、浙江省等地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69年5万843人,1970年2万6580人,1971年2万886人,3年共计9万8999人,到1973年已经超过10万人。^[44]197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撤销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几乎没有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1975年撤销。

在此,值得注目两点问题。第一,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现役军人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比例问题。这一比例,因建设兵团而不同。例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比例是1:35;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比例是1:42;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比例是1:100。与这些生产建设兵团相比,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干部较多,常年把持在5500—6000人左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0万人,现役军人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比例是1:17。^[45]显然,在诸生产建设兵团当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比例是最高。

第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生产建设兵团中所占的比例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批加入生产建设兵团,改变了原国营农场系统人员构成的比例关系。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972年的统计,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共有职工29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近110万人,约占总数的38%。^[46]接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最多的是黑龙江、广州、内蒙古、云南4个生产建设兵团。但另一方面,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各个生产建设兵团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生产建设兵团中所占的比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77%、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5%、云南生产建设兵团50%、广州生产建设兵团25%。^[47]一目了然,各生产建设兵团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占的比例最高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综上所述,在各生产建设兵团中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现役军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占的比例最高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与内蒙古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央、内蒙古的领导者对具有民族特征、历史特征、地区特征的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者怀有的悬念是分不开的。

这一悬念,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何风山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得到解读。他在发言中,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意义指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进一步宣告了……恶毒阻挠开发边疆,疯狂进行投降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他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起着重要作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对于确保祖国北方反修前哨的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47]

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和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拨乱反正,知青工作逐步纠正了“左”的错误,工作重点由一个时期的强制动员下乡,接受“再教育”,改变为城乡广开门路,各行各业共同承担安置知识青年就业。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发出了《1978》74号文件,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上山下乡作法。城市中学毕业生分配,由“一个面向”(上山下乡),改变为“四个面向”(升学、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48]即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调整了安置形式,主要是举办知识青年场、队和农工商联

合企业，把安置知青同发展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

1980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提出：“今后，不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9]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向终点。

中共中央的指示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新动向为背景，1979年3月28日—4月3日间

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规定：“未满17岁者，不作为上山下乡对象，上山下乡地区现定于集体农场”。^[50]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内蒙从1980年11月1日起不再动员上山下乡。1981年9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办公厅发出《1981》85号文件通知：“自治区党委第32次书记办公会议决定：为便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把城镇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做得更好，根据内蒙古党委和政府决定，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与自治区劳动局，从1981年10月1日起正式合并为一个机构，实行统一领导”。^[51]这标志着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在20余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共接收、安置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和区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1万6445人。^[51]

（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自给问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发生诸多问题当中，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多发性的问题。

首先，以自治区为单位考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情况。据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1978年的调查，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标准，以每人每年计，单身为150—180元。结婚后，人均110—130元。按照这个标准，全区上山下乡满2年以上的知识青年有5万9755人，其中生活自给的有2万8392人，占47.5%，生活不能自给的有3万1357人，占52.5%。^[52]同样，据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1977年的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万3955人中，生活能自给的有2万8398人，占44.4%，生活不能自给的有3万5557人，占55.6%。^[53]此外，据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的报告，1973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40%生活不能自给，有40%的人仅能挣回口粮钱。欠款欠粮的问题十分严重，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欠粮食约1000万公斤。^[54]同样，1975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者达50%。^[55]

其次，以盟、旗为单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情况。据内蒙古党委知识青年工作检查团1974年10月的调查，下乡到巴彦淖尔盟知识青年的67%生活不能自给，欠款、欠粮的现象普遍。^[56]1973年为实例，巴彦淖尔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000人，欠款金额到达60万元，借粮食23.2万公斤。^[54]据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知青工作检查团调查报告，1974年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808人欠款7万2204元，其中牧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73人欠款1万2921元，农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35人欠款5万9483元。全旗500多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有300多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只能半自给。^[57]凉城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200人中，740人欠款，共计4564元，平均每人63元，最高达280元。^[54]

再其次，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来考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据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1977年的调查，巴彦淖尔盟五原荣丰、沙河、银定图3个人民公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32人中，生活能自给的有36人，占27.3%，生活不能自给的有96人，占92.7%。这些知识青年中，超支欠款计2万9100元，人均303元，最多欠款1500元。^[58]

再次，以最小单位知识青年小组考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据内蒙古自治区上山下乡办公室 1972 年调查，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东红人民公社东河第 1 生产队（史家村）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5 人，分两组记工、分红、生活。A 组 2 人：付金瑜、时连捷；B 组 3 人：张清洁、滕贵升，代崇建。

A 组 1969 年、1970 年、1971 年分别分红 280 元、256.5 元、223.3 元，除粮、油、菜、煤款外，分别每人平均收入 50 元、38.25 元、21.65 元。B 组 1969 年、1970 年、1971 年分别分红 390 元、374.4 元、318.21 元，除粮、油、菜、煤款外，分别每人平均收入 46.66 元、41.44 元、22.74 元。（详见表 3）他们每年分红一般仅够零用，穿衣还得靠家里。[59]

表 3 察右前旗东红人民公社东河第 1 生产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每人平均年收入

年	组总受入	人均总受入	除支出后人均收入
1969 年	A 组：280 元	140 元	50 元
	B 组：390 元	130 元	46.66 元
1970 年	A 组：256.5 元	128.25 元	38.25 元
	B 组：374.4 元	124.8 元	41.44 元
1971 年	A 组：223.3 元	111.65 元	21.65 元
	B 组：318.21 元	106.07 元	22.74 元

（出所）内蒙古自治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察右前旗东红人民公社东河一、三两个队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情况的调查报告”（1972 年 12 月 8 日），内蒙古档案馆 324-1-11。

最后，以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例考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据上海赴内蒙古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 1974 年 11 月 5 日调查报告，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程度低。以 1973 年为例在生产队劳动分配 434 人中，生活能自给的有 122 人，占 28%；生活只能半自给者有 127 人，占 29%；生活不能自给的有 185 人，占 43%。生活不能自给和半自给的知识青年的生活来源靠四个方面：一是靠自己劳动收入，一般正常劳动，只能挣回口粮；二是生产队照顾，有的生产队看到知识青年生活困难，烧柴不算钱，吃菜随便拿；三是国家补助，1973 年内蒙古党委决定，对生活困难的知识青年平均每人补助 100 元，分几年使用，解决知识青年部分困难；四是家长支持，他们除了探亲期间穿衣吃饭全靠家长外，有时甚至连买盒火柴都苦难。[60]

（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要因

据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 1977 年的调查，农业地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原因有：（1）生产队的生产条件改变慢、分值低，每个工 0.3 元。此类情况，占 60%以上。（2）生活无底垫，婚后人口增加，收入不增加，特别是已婚女知识青年，由于孩子家务劳累出勤较少以及多数青年没有副业收入；有的因病残不能坚持正常劳动。此类情况，占 20%—30%。（3）有些青年不安心农村，回城时间长不积极参加劳动，表现不好，此类情况，极为少数。（4）有的女知识青年基本工分低，少数地方还有同工不同酬的情况。[60]

牧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原因有：（1）主要劳动项目是包牧群放牧，而上山下

乡知识青年流动性大，不适合包牧群放牧，因而没有固定的劳动项目，保证不了正常出勤，影响收入。(2)牧区的通用语是蒙古语，但是汉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懂蒙古语。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加之居住分散，知识青年婚姻问题不好解决。据锡林郭勒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统计，1978年全盟25周岁以上的未婚青年520多名。由于婚姻问题解决不了，致使相当一部分人不安心。(3)单一牧业经济，存在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牧民抢工，挣分红问题，价值安置经费不足，社队补贴多，不少地方不愿意接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1]

无论农业地区还是牧区，有其共同原因：(1)不适应上山下乡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回城逗留时间长。(2)因年幼、体弱、多病，长期不能参加正常劳动；已婚女知识青年，因家务和孩子劳动出勤率少。[62]

试举实例。例如，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1973年在生产队下乡的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37人中，有56人生活不能自给。56人中，由于所在生产队工分值低，长年劳动却生活不能自给的有21人；回城时间长，劳动不积极，出勤率低的有22人；体弱多病，不能坚持经常出勤的有8人；已婚女知识青年，由于孩子、家务劳累，影响出勤的有5人。[62]再如，土默特左旗1973年在生产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7人中，因生产队生产水平低，年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21人；北海流生产队1973年每工0.17元，知识青年薄维敏做了350工，全年收入不到60元，领了口粮，还倒欠款。[62]从上述调查情况来看，主要由于所在生产队的生产水平底难以达到生活自给的比数不少。

(三)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问题

据1973年9月10日内蒙古知识青年办公室向内蒙党委提出的汇报，不少领导干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理解不深，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思想上，把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作“临时措施”、“权宜之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单纯的领导就业问题，锻炼两年之后“再分配”。没有当作经常的政治任务抓下去，没有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54]

有的县委书记检查说：“头年紧，二年差，三年头上没人抓”。专搞知青工作的同志，由于工作得不到支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安办”成了出了名的“难办”，普遍不安心。社队干部认为是“麻烦工作”、“额外负担”，觉得“多一个不如少一个”，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作“包袱”，片面理解“送走的越多，工作的成绩越大”。因此，各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机构不健全，不得力，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到了1973年，有7个旗、县、市尚未设立专门机构。[54]

少数基层干部认为，知识青年锻炼几年终归是要走的，思想上不进行扎根教育，工作上不作长远打算；不把知识青年看作力量和财富，而是看作负担和包袱。[62]

在牧区，一部分旗、人民公社，没有把知识青年工作列入提示日程，个别的甚至认为在牧区安置知识青年没有必要，“是负担”。更值得指出的是，一部分地区的安置形式以农为主，脱离牧业、脱离牧民，不适合牧区特点。[63]这说明，对牧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调查研究不足，这一事实也得到了内蒙古知识青年办公室的领导的承认。

此外，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地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在社会上，未能得到充分理解，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54]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生活不能自给，定期或不定期向家里要钱。为此，有的家长埋怨说：“付不完的再教育费”。[62]

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中，一辈子安心在农村、牧区工作的只占30%，而不安心在农村、牧区工作的达70%。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障碍，主要是缺乏长期扎根农村的思想

准备，所以对生活安置的问题，凑合对付，得过且过。另外，对调队、并点有四个怕：怕知识青年集中不自由，怕同其他知识青年合不来，怕知识青年人数多抽调机会少，怕新到一个地方人地生疏不习惯。[6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81年5月2日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的报告中可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运动的思想动态是认为“下乡本身吃了亏”。[64]下面试分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运动产生这些认识的背景有哪些。

如前所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调整了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上山下乡作法。城市中学毕业生分配，由“一个面向”改变为“四个面向”。宣传侧重鼓励在城市就业，很少宣传在农村做贡献，只宣传城镇待业青年，不宣传下乡知识青年。因此，下乡知识青年觉得在社会上被人看不起。[64]为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不再安心从事农牧业生产了。其背景除了已经探讨过的生活不能自给问题之外，还有如下的诸多问题。

(1) 住房不足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住房专用的资金、建筑材料等是由国家分配。但是，专用资金、物资等在管理与使用方面挪用问题是多发性的、普遍存在。例如，1973-1978年间，土默特右旗吴坝公社接收、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726人，国家下拨的知识青年专用经费32.2万元，专用建筑木材169m³。根据清查知青经费物资试点工作组的调查报告，32.2万元专用经费中，被个人贪污119元，被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挪用4.99万元。169m³专用建筑木材中，被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及个人挪用45.3m³。[65]再如，1967-1977年间，国家下拨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县知识青年专用经费中，占63.4%的11万1000元被人民公社、生产队挪用或个人贪污、冒领。[61]由于这些原因，全自治区15%-20%的生产队没有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住房，个别人民公社有70%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没有房子住。没有住房的知识青年只能插在社员家里。[54]

(2) 知识青年被害案件问题。如表4所示，至1976年末，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打击报复、强奸、盗窃等受害案件共计514件，其中打击报复案件22件、逼婚诱奸以及强奸案件253件、杀害案件9件、盗窃案件118件、其他案件112件。从案件的类别来看，这下案件中对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逼婚诱奸以及强奸案件最多，253件。从案件发生的地区来看，乌兰察布盟最多，225件。到1976年末为止，514件案件中，466件已经处理，还有48件尚未处理。

表4 内蒙古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被害事件一览表（至1976年末、单位：件）

受害情况								处理情况							
地区	地区 合计	打 击 报 复	逼 婚 诱 奸	强 奸	杀 害	盗 窃	其 他	地 区 合 计	死 刑	死 缓	徒 刑	扣 捕	纪 律	其 他	尚 未 处 理
锡林郭勒盟	76	4	49	9	9	1	13	76	2		51	12	3	9	1
乌兰察布盟	225	6	70	42	4	66	37	200			60	26	19	93	25
伊克昭盟	8		5			2	1	7	1		6	1			1

巴彦淖尔盟	98	11	14	9	5	11	48	95	1	1	31	8	13	41	3
呼和浩特市	41		26	9		2	4	35	3		17	11		4	6
包头市	56	1	3	16		32	4	45	1	1	23	8	12		11
乌海市	10			1		4	5	9			3	3		3	1
共计	514	22	167	86	9	118	112	466	7	2	191	69	47	150	48

（出所）“1977 年内蒙古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基本情况年报表”（1978 年 5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324-1-50

（3）经济方面不平等问题。在经济待遇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知识青年的自留地、自留牲畜从数量到质量都不如当地社员。例如，呼和浩特市郊区的社员自留地是 7 分，而知识青年只有 4 分，并且知识青年的自留地多是“三边地”（地边、路边、坎楞边），质量低，产量低。^[54]

（4）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全卫生、疾病医疗的关心很不够。据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盟 he 生产建设兵团的不完全统计，1969 年至 1973 年间，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发生事故 990 起，造成死亡 144 人，受伤 801 人。还有，由于对知识青年生活安排的不好，劳动强度过重，对女知识青年生理卫生照顾不够，因而在知识青年中患胃病、风湿性关节炎、妇女病的相当普遍。^[54]

（5）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思想动态。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调查报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心态有日下几种：

第一，认为下乡吃了亏。如前所述，11 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宣传上重视鼓励在城市就业，不重视在农村做贡献；宣传城市待业青年，不宣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觉得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第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年，在生活、生产、学习等方面重视不够，管理不善，知识青年的许多实际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农村包产到户，90%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回了城市。第三，到运动后期，还在乡的知识青年的大部分是一般工人、一般干部和贫民百姓的子女。他们认为有门路的人早已回城安排了工作，自己还在农村，觉得不公平。第四，属于冤、假、错案中被抓、错判的知识青年有一部分改正之后，在生活、工作等方面没有较好的安排。第五，过去，中央、内蒙树立的一些先进知识青年标兵，在农村、牧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未得到妥善安排。^[64]由于上述原因，知识青年上访的数量增加，仅从 1980 年 12 月 15 日至 1981 年 5 月 5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共收到知识青年来信和接待上访 270 多人次。^[64]

七、结论

通过本文考察，得出的结论可归纳如下几点：

第一、初期的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地方政府自主组织和知识青年志愿的形式下进行的，60 年代后半期之后是在党政机关主导下进行的。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未能按计划安置知识青年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实际上在于以下几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运动的消极态度；上山下乡运动成了知识青年家长和所接收知识青年的地方干部的负担；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运动游离畜牧业与牧民，不适应畜牧业经济与牧区地区特征等。但是，当时被认为其原因在于源于资产阶级、修正

主义、官僚主义。为此，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当时的以“四清运动”“五反运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一加以推行的结果，安置人数有所增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由慎重转为激进，所安置人数剧增。

第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占的比例和现役军人干部所占的比例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第三、上述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要因与背景主要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环境中，内蒙古对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国防安全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第四、“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中所发生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被“断定”为“乌兰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破坏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造成的结果。“再教育”形式下的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被当作内蒙古三大冤案之一的“挖肃”运动的内容之一加以强力推行。

第五、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问题严重，加重了家长的负担。运动成为了接收知识青年的地方干部的负担，同时也没有得到地方社会理解与重视。知识青年也没有认真、积极地对待运动。其结果，发生了诸多问题。

注释

①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与原因，请参照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等。

②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41页）。毛泽东在1957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再次指出“我国的500万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88页）。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列到被打倒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称为“臭老九”。

③1953年以后，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进行了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得到了苏联的150项的大量援助。

④“三支两军”是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统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指贯彻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指部队对一些部门、单位、系统等进行军事管制；“军训”是指派部队对大中专院校进行军训。

⑤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的形势下，部队着手大量接受、改造便将农场，尤其是劳改农场，使农垦队伍成为庞大的“准军事力量”。据1972年统计，全军总人数为600万人，其中只有51%的306万人是作战部队（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页）。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 1979-8-30.

- [2] 刘小萌等. 中国知识青年事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134.
- [3] 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4] 定宜庄. 中国知青史: 初澜(1953—1968)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刘小萌. 中国知青史: 大潮(1966—1980)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 [5] 顾洪章.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 [6] 金大陆, 金光耀.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M]. 上、中、下,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56.
- [7] 渡辺一衛. 湖南文革と『省無聯』[A]. 加々美光行編. 現代中国の挫折 文化大革命の省察[C].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1985, 121-132; 川副延生. 中国黒龍江省における知識青年の国営農場への下郷とその特徴について—生産建設兵団第二師団の場合[A]. 名古屋商科大学総合経営・経営情報論集[C]. 53 (1), 2008: 33-54; 崔勇. 中国における知識青年農村下放に関する分析[A]. 桃山学院大学経済経営論集[C]. 48 (4), 2007: 325-355.
- [8] 邢野. 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 内蒙古知识青年史料专辑[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9; 史镜等. 赴内蒙古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报告[J]. 社会科学研究, 1986, (2): 36-43; 刘鳳琴. 呼伦贝尔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09, (6): 13-16.
- [9] 毛泽东选集[M]. 第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247-248.
- [10]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M].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60年4月10日通过, 内蒙古档案馆 324-2-24.
-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M]. 1963年7月30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2-24.
- [12] 顾洪章.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78-79.
- [13] 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会议纪要[M]. 1964年6月8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1.
- [14] 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关于当前我区安置工作情况的报告[M]. 1964年9月14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1.
- [15] 当前全区一九六四年安置进展情况[M]. 1964年9月7日;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工作汇报[M]. 1964年第11期, 内蒙古档案馆 324-2-2; 当前各地安置工作情况[M].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工作汇报[M]. 1965年第8期, 内蒙古档案馆 324-2-4.
- [16] 全区超额完成动员计划, 各地正集中力量抓巩固工作[M]. 1965年10月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工作汇报[M]. 1965年第23期, 内蒙古档案馆 324-2-4.
- [17] 华北局安置工作汇报会议的汇报提纲[M]. 内蒙古档案馆 3241-1-1.
- [18] 关于安置京津二市下乡青年的阶段情况报告[M]. 1965年8月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工作汇报[M]. 1965年第16期, 内蒙古档案馆 324-2-4.
- [19] 人民日报, 1964-8-9, 1965-7-9.

- [20] 仁钦. 内蒙古“四清运动”几个问题之探讨[J]. 蒙古学问题与争论, 2011, (7): 186-198.
- [21] 关于安置京津二市下乡青年的阶段情况报告[M]. 1965年8月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下乡青年工作汇报[M]. 1965年第16期, 内蒙古档案馆 324-2-4.
- [22] 标兵材料简介补充[M]. 1975年8月, 内蒙古档案馆 324-2-31.
- [23]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M]. 1976年9月7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2-24.
- [24] 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全区安置工作会议纪要[M]. 1965年11月18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3.
- [25] 内蒙古党委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问题[M]. 1965年1月24日, 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委员会编印. 内蒙古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M]. 第二卷下册, 1987. 162.
- [26] 刘小萌等. 中国知识青年事典.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591.
- [27] 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办公室. 关于当前安置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M]. 1967年8月31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 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办公室, 自治区红色革命造反战斗队全体革命群众. 关于加强安置工作指导, 充实自治区安置部门力量的紧急请示报告[M]. 1967年10月24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
- [28] 陈东林等主编, 西纪昭等翻译. 文化大革命事典[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7. 447-448.
- [29] 国务院知青办. 知青工作文件选编[M]. 内部资料, 39页.
- [30] 史卫民.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困退”[A]. 金大陆, 金光耀.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C]. 上、中、下,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44.
- [31] 一九七七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情况年表[M]. 1978年5月20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0.
- [32] 刘小萌等. 中国知识青年事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592-595.
- [33] 刘小萌等. 中国知识青年事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594.
- [34] 内蒙古自治区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落户的暂行办法(草案)[M]. 1967年6月28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
- [35] 内蒙古安置领导小组, 自治区红色革命造反战斗队全体群众. 关于加强安置工作知道, 充实自治区安置部门力量的紧急请示报告[M]. 1967年10月24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
- [36] 内蒙革委会常委雷代夫同志在全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1968年4月1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7.
- [37] 刘小萌等. 中国知识青年事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614-615.
- [38]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 关于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的报告[M]. 1968年3月22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6.
- [39]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刘文研在全区中学毕业生分配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 [M]. 1968 年 8 月 2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9.
- [40] 滕海清同志接见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M]. 1969 年 3 月 1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2-12.
- [41]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草案) [M]. 1969 年 3 月 1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10.
- [42] 知青工作调查专题材料之一: 关于城镇毕业生的分配问题 [M]. 1978 年 4 月, 内蒙古档案馆, 324-2-56.
- [43] 全区知青工作会议基本情况 [M]. 1979 年 12 月, 内蒙古档案馆 324-1-64.
- [44] 史卫民, 何岚. 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0; 关于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知识青年的通知 [M]. 1970 年 7 月 30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13.
- [45] 史卫民, 何岚. 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5-26.
- [46] 史卫民, 何岚. 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2.
- [47] 史卫民, 何岚. 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3.
- [48] 国务院知青办. 知识青年工作文件汇编 [M]. 内部资料, 99-107.
- [49] 顾洪章.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83-184.
- [50] 邢野. 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37-338.
- [51]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概况 [M]. 1981 年 10 月, 内蒙古档案馆 324-1-75.
- [52] 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问题 [M]. 1978 年 4 月, 内蒙古档案馆 324-2-56.
- [53] 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七七年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基本情况报表 [M]. 1978 年 5 月 20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0.
- [54] 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 向内蒙党委汇报的提纲 [M]. 1973 年 9 月 10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19.
- [55] 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办. 关于全区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M]. 1975 年 11 月 10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37.
- [56]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知识青年工作检查团. 巴盟地区知青工作检查汇报材料 [M]. 1974 年 10 月, 内蒙古档案馆 324-1-27.
- [57] 内蒙乌盟知青工作检查团. 关于四子王旗知青工作检查报告 [M]. 1974 年 9 月 27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28.
- [58] 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问题 [M]. 1978 年 4 月, 内蒙古档案馆 324-2-56.
- [59] 内蒙古自治区上山下乡办公室. 关于察右前旗东红人民公社东河一、三两个队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情况的调查报告 [M]. 1972 年 12 月 8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11.
- [60] 上海市赴内蒙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 关于上海在内蒙插队的知识青年适当集中、实现生活自给问题的初步调查 [M]. 1974 年 11 月 5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2-31.
- [61] 锡林郭勒盟在牧区安置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 [M]. 1978 年 4 月 20 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2-56.

[62]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办公室. 关于少部分下乡知识青年不能自给的请示报告[M]. 1967年4月18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 上海市赴内蒙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 关于上海在内蒙插队的知识青年适当集中、实现生活自给问题的初步调查[M]. 1974年11月5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2-31.

[63]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办. 关于全区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M]. 1975年11月10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37.

[6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 内蒙知青工作基本情况的汇报[M]. 1981年5月2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75.

[65]清查知青经费物资试点工作组. 关于清查知青经费和物资试点工作报告[M]. 1978年5月31日, 内蒙古档案馆 324-1-53.

Examination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lower part exercise in Inner Mongolia

Rinqin

(Center for Mongolia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that it was freed a bottom to farm village area and the cattle breeding area rises to 20 million by the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campaign of familiarization with the masses through country work periods pushed forward from 1955 through 1981 in China in total. Their thought recognition tried investigation whether how about in question whether there was any characteristic to the Back-To-A-Farm-Village Movement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in the Inner Mongolia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corps after having been based on a conventional study in this report whether there we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and what kind of connection as for the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campaign of familiarization with the masses through country work periods under "a countercurrent phenomenon" and "the remed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using the docum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d not been used by a conventional researcher mainly how abou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life self-support problem of the Back-To-A-Farm-Village Movement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campaign of familiarization with the masses through country work periods

收稿日期: 2015-06-13;

作者简介: 仁钦(1963-),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人。内蒙古历史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